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时论选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
时论选集

第一卷

上册

張枬 王忍之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
时论选集

第二卷

下册

張枬 王忍之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二卷

(上、下兩冊)

張枬 王忍之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34\frac{3}{4}$ · 插頁 13 · 字數 809,00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800 定價(六)4.90元

統一書號 11002·295

第二卷序言

—

1905—1907年間，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了广泛发展的新时期。

1905—1907年間，农民群众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继续发展。抗捐暴动、反教会斗争，此伏彼起，震撼着瓦解着反动统治的基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某些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强，它的活动比从前活跃了。1905年，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掀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迫害排斥华工的群众性运动。从沿海到内地，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抵制美国货。以后，又展开了以收回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为中心的向帝国主义者收回利权的运动，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了；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用俄国的事实来证明，必须改变中国的专制统治，必须给予资产阶级以政治地位。这些情况表明，资产阶级正在加紧努力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的革命运动，就迅速地高涨起来。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和标志。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里，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准备。他们出版了许多宣传革命的书刊，组织了一些革命团体，从事发动起义的活动。陶成章在“浙

案紀略”中說，由于革命者的宣傳活動，“甲辰(1904年)后，內地革命風潮大熾”。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一書中回憶說，1905年，在歐洲留學的中国學生已經多數贊成革命。孫中山指出，這是因為這些留學生“皆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兩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但是，在同盟會成立之前，革命宣傳還缺乏共同的綱領；革命組織都是些局處一隅的小團體，它們分散地孤立地行動。要推進革命運動，就必需統一革命的目標，統一革命的力量，統一革命的行動。順應着這種要求，在孫中山的倡導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組織就聯合起來，組成了中國革命同盟會。

和以前的革命團體不同，同盟會是按照資產階級政黨的樣式，由十七個省的革命分子組成的全國性的組織。根據孫中山的倡議，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自己的綱領。同盟會成立後表現出了蓬勃的革命朝氣，迅速地發展了組織，集中力量做了兩項工作：出版機關刊物“民報”；聯絡會黨和新軍發動多次起義。同盟會所做的工作把革命推向了高潮。

清政府的大臣端方，在一個奏摺中，對革命的發展作了這樣的描述，他寫道：“一二不逞之徒……恣其鼓簧，思以瀆皇室之尊嚴，倡叛逆之異志。加以多數少年，識短氣盛，既刺激于時局，忱憤失度，復偶涉西史，見百年来歐洲二三国之革命事業，誤認今世文明，謂皆由革命而來，不審利害，唯尚感情。故一聞逆黨煽動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百和，如飲狂泉。……逆賊孫文演說，環听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愈數萬。……近訪聞逆黨方結一秘密會，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說運動，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冊子，或用歌謠，或用白話，沿門贈送，不計其數。入會之人，日以百計，踪跡詭秘，防不胜防。其設計最毒者，則專煽動軍營中人，且以其黨人投入軍隊。……奴才聞此，痛憤之余，繼以忱慮，竊以為今日中國，大患直在腹心，縱任之則潰決難收，芟夷之則全局糜爛。”端方的這

个奏摺，典型地表明了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面前，清朝统治者万分仇恨，惶恐不安。为了应付局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議論紛紛，要求制訂新的策略。

1905年起，清王朝的高級統治集团中間，如駐外使臣、督撫、尚書以及皇室亲貴，都有一些人主張“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有的人还为此上了奏章。1905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政治。1906年，五大臣回国，奏請“仿行宪政”。經過御前會議上的一番爭論之后，1906年9月，頒布了詔书，宣布“預备仿行宪政”，并規定从改革官制入手。同年，清政府还頒布了“实业賞爵草章”。1907年，清政府又下令准备召开带有議會性质的資政院和諮議局。这些做法是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緒，誘惑拉攏资产階級，削弱地方督撫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总之，是为了消弭革命，以維持处在風雨飄搖中的反动統治。

资产階級改良派虽然不滿意清政府在实行立宪的步驟上拖延时日，蹣跚而行，但是，他們以为，清朝統治者既然已經表示要立宪，那么，进行合法斗争的大門就打开了，从此以往，經過他們的“劝說”“要求”，就能够使清朝統治者步步退让，以至使政权的性质发生有利于资产階級的改变。因此，他們一方面利用清政府的种种表示来宣傳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張，企图使人民离开革命的道路；一方面积极地組織团体，研究宪政，上书請願，催促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他們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为挤进政权作好准备。1906年，在上海成立了由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改良派士紳組織的“預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組織了“政聞社”。这些組織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清朝統治者已經不能照旧統治下去了，资产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在积极活动，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局势的变化，以便使局势的发展最有利于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階級、阶层的利益。在这

样的情形下，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的斗争以更尖锐激烈的形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1905—1907 年間，革命刊物的头等重要的内容就是批駁改良派的政治主張，而改良派刊物的主要打击方向，則指向日益发展着的革命潮流。

二

1905—1907 年間出版的革命刊物有“二十世紀之支那”、“醒獅”、“民報”、“復報”、“漢帜”、“云南”、“四川”等。“二十世紀之支那”是“民報”的前身，“民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其他一些刊物和同盟会也有联系，刊物的创办人和撰稿人很多是同盟会会员。这些刊物在不同程度上宣傳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張。

“民報”是当时出版的革命刊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刊物，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論壇。“民報”宣傳的基本思想是孙中山在“发刊詞”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具体内容就是同盟会綱領中所說的“驅除韃虜、恢复中华、創立民国、平均地权”。“民報”所宣傳的这个思想，是当时革命者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得到的認識的概括。在 1900 年以后出版的革命书刊中，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建立民主国家的思想，改革經濟制度实行所謂“社会革命”的思想，都已經屢見不鮮了。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制訂出简单明确的革命綱領，是孙中山的功績。“民報”在和改良主义思想斗争中闡述和宣傳了这个革命綱領。

“民報”从各个方面論述了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有不少文章把清朝的反动統治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考察。它們指出：滿洲貴族为了维护其政治特权和經濟利益，对外將繼續执行屈辱的卖国的政策，因此，在清王朝的統治下，中国就将繼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可能走上富强的道路。“民報”证明說，唯一的出路是革命，革命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

和国。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建立以後，還要做些什麼呢？在這裡，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面臨着他們的西方前輩所沒有遇到過的情況和問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思想家深信，資本主義制度是最完善、最美妙的制度，也是永世長存的制度。中國資產階級舉起革命旗幟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已經明顯地尖銳地暴露出來，無產階級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形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因而，向西方吸取革命思想的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向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物質文明的同時，又在考慮如何“補救”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如何才能“預防”和“避免”社會主義革命了。

“民報”上發表的不少文章指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物質財富雖然迅速地增加了，可是享受這種進步成果的只是少數富豪，廣大人民仍然过着困苦的生活；民主共和國雖然建立了，可是它實際上是“富人”專制，貧苦人民並沒有擺脫“富人”的壓迫。特別使當時革命者驚心動魄的，是中小資本家在托拉斯壟斷組織的排擠并吞下迅速破產；是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革命風潮的蓬勃發展。出路在那裡呢？他們翻譯介紹各種各樣的標榜社會主義的學說，其中有无政府主義，有國家社會主義，有社會改良主義，等等，想從中找到答案。他們也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可是，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他們本身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使他們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更不可能真正地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他們實際上只是想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但是，他們以為可以有一種比較“善良”的資本主義，結果就可以不出現壟斷資產階級，以免中小資本家陷於破產的困境。他們並不想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只是想略為觸動一下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們提出了“平均地權”的主張，並且把它看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改革，以為只要做到了這一點，

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恶果，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会再发生了。这种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学说是空想的反动的，可是，由于它接触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根本问题，因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又具有革命的进步的作用。

“民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比较充分地阐述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他革命刊物，就其主导方面来看，也在宣传这个纲领中起了作用。如果分别地来看“民报”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那就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全部地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思想，他们在解释这个纲领时包含着不少混乱和分歧。

有的刊物，例如“汉帜”，有的人，例如章太炎、吴稚晖等，号召推翻清王朝，可是其出发点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这篇文章中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而缀学知书之士，纔识一名以上，皆汲汲于远谋，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余虽踣蹙，亦不能不随俗为言”。章太炎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革命者的认识。这类革命者，主要地只是具备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虽然也随波逐流地谈论民主共和，其实却以为“共和政体”未必就比“专制政体”更好一些。他们以为，推翻清王朝是革命的唯一目的，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定复仇之是非”）。

另一些革命者进了一步，具有了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同。有的人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汉族……不可以与满洲人长此偕处，无论以立宪饵之也，即有共和极制，非与满洲为群无从得之者，亦有舍置之而已”（“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有的人说：“革命之中，有

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按：指反对专制，建立民国）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绝命书”）。

“民报”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表明，真正赞成平均地权的革命者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对于平均地权的解释也不一致。有的主张由国家核定地价，以后地价和地租的增加部分归国家所有；有的则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有的说，平均地权并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已有”（“‘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有的说“豪富之田，不可不藉……夺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此则仁术之至大者也”（“悲佃篇”）。

上述情况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同盟会会员以及受同盟会影响的革命者，有的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地主阶级中的反满分子。这就规定了他们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不能达成完全的巩固的思想一致。这种情况的存在，预兆了在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同盟会却陷于分裂和瘫痪，预兆了有些革命者在辛亥革命后，很快就离开了革命的队伍。

在当时，革命派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在必须依靠革命斗争来推翻清王朝这个最迫切的问题上，革命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出版的刊物的一个共同内容就是反对改良主义的幻想。

1905—1907年间出版的宣传改良主义的刊物有“新民丛报”、“东方杂志”、“中国新报”、“政论”等。这些刊物反对同盟会的纲领，力图证明：不存在什么民族压迫；中国人民没有能力建立民主的国家；如果实行平均地权，国家的“基石”就动摇了；如此等等。这些刊物的共同的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经过武装起义，彻底摧毁清王朝。

在反对革命的大合唱中，这些刊物所唱的调子是各有不同的。“中国新报”上发表的杨度的文章说，清政府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根

本用不着动用武力，只要在“左右叱咤声中”就能“促政府之倒”（“‘中国新报’叙”）。“新民丛报”上发表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则着重于把革命描繪成为极端恐怖的危險行为。他們說，革命必然會遭到旧势力的猛烈反抗，会引起“暴民”騷动，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結果只能是連年爭战，流血成河，民不聊生，亡国灭种。最使康有为、梁启超这类人胆戰心惊的是：如果发生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那么局势的发展就不是资产阶级所能控制的，人民会起来用革命暴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在他們看来，这是犹如洪水猛兽一样可怕的。因此，他們三番五次地說：“民气犹火也，不善用之也可以自焚”，他們歪曲地援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事例作为证明。或者散布不必依靠革命暴力，反动的清王朝就会自行垮台的幻想，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或者誣蔑革命暴力，否认其正义性，这是当时改良主义者反革命本质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革命，是这些刊物所反对的，那么它們开出来的药方是什么呢？这些刊物的主張随着形势的变化也有所变化。“东方杂志”1905年5月发表的文章还以为，民主共和也好，君主立宪也好，都不是出路，唯一的办法是“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利用中国之政教論”）。到了1906年初就不同了，这时发表的文章說，立宪势在必行了，只是要立宪必須先行普及教育（“論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而1907年初則一反已往的論調說，不能等待教育普及后才立宪，只有立宪以后才能普及教育（“人民程度之解釋”）。“新民丛报”以及继承“新民丛报”的“政論”也有相类似的情况。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主張由清王朝实行“开明专制”，以后逐漸提高調子，到成立“政聞社”、创办“政論”的时候，梁启超就主張“实行国会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了。形势比人强，随着革命的发展，清王朝伪立宪丑剧的揭幕，改良主义者像变色龙那样迅速地变换着自己的姿态，以免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改良主义者的具体主張尽管有某些变化，他們之間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根本上来看，他們开出来的药方，一言以蔽之，就是梁启超所說的“劝告”和“要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反复說明，只要向清朝皇帝委婉陈說“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对于清王朝是有利的，只要人們起来“要求”，而要求的条件又是清王朝所能够接受的，那么清王朝是会欣然同意，或至少是会被迫地实行立宪的。梁启超說，人們要求立宪时，唯一正当的手段是“請願”和“不納租稅”，决不能进行革命。这种思想在“政聞社宣言书”中得到了精确的表述：“政聞社所指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絕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絕无扰紊治安之举”。总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只想在保持清王朝統治、不違背清王朝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合法的斗争，求得某些枝枝节节的改良，以为这样就能够消灭革命，就能够使自己政治上、經濟上的要求逐漸地得到滿足。

“新民丛报”和其他改良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曾經指出了一些革命者沒有看到、不敢看到的事实眞象(关于这点，我們后面再談)，但是它們从中得出的反对革命的結論却是根本錯誤的、反动的。反过來說，革命者的認識虽然包含着严重的錯誤(关于这点，后面也还要談到)，但是他們相信应当革命并敢于革命。革命者在自己的刊物上有力地证明：改良主义者贊賞的“預备立宪”是“形式上的变更”，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目的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改良主义者所說的“劝告”和“要求”，其实是向清王朝乞求恩賜，把政治进步、革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而这决不会有什么結果，只有依靠革命斗争才能改变中国丑恶的現状。革命者駁斥了不必訴諸武力，清政府就会垮台的幻想，說“政府之待人民以兵力，而人民乃以叱咤之声报之，終亦必亡而已矣”(“中国新报”)。革命者指出，不应当因为害怕“杀人流血”而不敢革

命，这样无异于“見將潰之疽而戒毋施刀圭”，而且即使不革命也免不了“杀人流血”，不过这时的情形是“一方操刀而屠，一方齧腭而死”。革命者也指出，不应当因为害怕帝国主义干涉而不敢革命，因为不革命必定要亡国。

革命者在激烈的斗争中阐明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从根本上击败和摧毁了改良主义的思想障地。1907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数年以来，革命論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鮮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勢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誓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懾，而口为所箝”（“論中国現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改良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处于劣败的地位了，不得不承认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了。

三

在这场論战中，革命派虽然战胜了改良派，但是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問題上，他們有着許多錯誤的認識，因而对于改良派提出的反駁和质难，不能都做出正确的有力的答复。

改良派的主将，政治经历丰富的康有为、梁启超，游历了欧美日本以后，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有了比較多的了解。他們認識到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决不容許中国经过革命而富强起来，必定要扼杀中国革命。他們嘲笑那种以为帝国主义国家不会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想法是幼稚的，是“掩耳盜鈴以自慰也”。他們认为，不管革命派宣称革命将如何遵守国际法，帝国主义总要制造借口出兵干涉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倒是看准了。他們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但是，他們被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吓倒了，更加胆

怯，不敢革命了。对于人民群众，他們是既瞧不起，又害怕的。他們說，中国人民无力抵抗帝国主义，民气“虽时或偶收奇效”，但不足抵御帝国主义“强大之海陆軍”；說依仗民气就不怕帝国主义是“大言壯語，聊以自豪”。他們問道：“义和团之民气，曷尝不如茶如潮，而列国联軍之威力，曾撓折焉否也？”（“申論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他們又怕人民群众的“暴乱”在攻打帝国主义时会牵动他們所维护的社会基础。他們拿法国大革命做例子，证明如果利用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結果资产阶级“温和派”决不会得到好处。他們还恫吓說，革命的結果不是亡国，就是得到一个比清王朝还不如的、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傀儡政府。既怕帝国主义又怕人民群众的改良派，为中国选择了一条由开明专制进到君主立宪的日本維新式的道路，幻想利用帝国主义对华“均勢”，把封建势力和民族資本的力量联合起来，抵擋住帝国主义資本输出的洪流来发展資本主义。

革命派反对走日本明治維新式的道路。可是他們却拿日本維新未尝遭到列强干扰的史实作为帝国主义并不反对中国强大起来的一个論据。在革命派看来，帝国主义所以能在中国橫行霸道，完全是昏庸腐敗的清王朝招来的；如果中国成为民主的强国，帝国主义就不再欺負它了。于是他們幻想着，只要有秩序地进行革命，只要革命不直接触犯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帝国主义不但不会反对和破坏中国革命，还要“見好于我而不暇”呢。他們声明“革命，非排外也”，“排外，非所計也”。他們向帝国主义保证，革命一定要按着国际法的准則行动。他們向帝国主义宣布：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将继承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簽訂的条約，說“新立政府必承认其条約，……于各国之債权，亦断許其无損失也”（“民报之六大主义”）。明明知道那些条約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約，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鎖鏈，为了求得革命不被干涉，为了求得新政府被帝国主义承认，他們居然准备承认那些卖国条約，承担不平等条約規定的义

务。这些只敢在帝国主义允許範圍里，謹慎小心地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帝国主义的認識是多么模糊不清。他們的革命性是多么不彻底，在帝国主义面前是多么軟弱。

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还表现在战争与世界和平問題上。他們认为帝国主义是爱好和平的。他們相信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由弱变强，說强大的中国能够使帝国主义摆脱因爭夺中国而造成的緊張局勢，因而也就消弭了列强之間的战争。他們向帝国主义宣傳說：“中国强，則远东問題解决，远东問題解决，則世界真正之平和可睹”（“民报之六大主义”）；“中国自强乃可群息覬覦以免战争之禍”（“革命今勢論”）。这就是說，中国强了，帝国主义失去爭夺的目标，它們的矛盾也随之消失，于是远东問題解决了，世界和平也就有保障了。在这些革命者的心目里，事情完全顛倒过来了，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被它掠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倒成了战争的禍根。

革命派所以举不起反帝的大旗，所以只想在帝国主义恩准下进行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們和改良主义者一样，被帝国主义强大的外表吓坏了，不敢触犯帝国主义的虎威。

革命派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得出帝国主义沒有瓜分中国的原因是：“一由于各国間維持势力平均，一由于知我國民之实情”。有的革命者曾說过，如果“事出意外”，“外国干涉竟来”，那么“勿謂我國民甚弱，而各国之兵力至强也，练兵不能征服国民軍，历史所明示矣”。（“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有的人还說，“使列强干預于种族革命方起之时，則鼓我士气，挺而走險，……顛复冥頑不灵之恶劣政府，……然后与列强爭战”，“虽或兵不精，械不利，难望如拿破侖之敗联军，然即兵败师挫，亦不过賠餉耳、割地耳”。（“‘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論之駁議”）从这些言論看出，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視人民群众力量的，并且准备利用这种力量，所以才不致因

为害怕帝国主义而不敢革命。但是，他們是不是真正相信并且准备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呢？他們担心“自然暴动”发展起来会像义和团那样冒犯帝国主义而惹出大禍。他們想通过宣傳来控制革命，把“自然的暴动”改造成“有秩序的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这篇文章說：“今日內地之暴动，往往不免含排外的性质，……此等暴动，可謂之自然的暴动”；“此等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今日之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終达”。他們想借着人民的威力逼使帝国主义让步，实际上是他們自己向帝国主义做了极大的让步。

这些錯誤的論点遭到改良主义者的猛烈抨击。梁启超在“暴动与外国干涉”的文章里列举了很多条理由以后得出的結論是：“……秩序的革命絕不詒外国以干涉之口实，苟非欺人，其必自欺而已”。他說那种“謂以一二人之力，能左右此大众，使一絲不紊，为規律的行动，此真书生之見，架空之理想也”。梁启超在这里确实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抓住了革命派的弱点。对这些駁論，革命派始終做不出能自圓其說的答案。革命派认敌为友，錯把帝国主义豺狼当朋友，对人民群众想駕御防范。这种观点，使得革命派在反帝問題上和改良主义者实际上相差无几。

当时，清王朝是帝国主义最馴服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最高代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仇恨集中到清朝統治者身上。反对清王朝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打击。要不要推翻清王朝是当时革命和妥协、激进和保守最重要的分野，是进步和反动的試金石。

論战中爭辯得最激烈的一个問題是：清王朝算不算“異族統治”？那时存不存在民族压迫？应不应当“以武力顛复中央政府”？改良派认为“滿人与我不能謂为純粹的異民族也”，改良派的这个論点不能說是完全錯誤，他們的錯誤在于他們既否认实际存在的